

倫理抉擇中Reamer社會工作價值 排序指導原則闡釋與商榷

王篤強、李素慶

壹、前言

社會工作作為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專業，在不同發展階段中，對社會工作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乃至社會工作本身有著不同的價值關注（Reamer, 1998, 2013b）。身處其中的社會工作者，其角色、地位、功能與環境相互衝突時，往往必須在高度急迫、複雜和不確定的情境壓力下，對兩個自身都討厭的、甚至不清楚哪個才是正確的價值選項中，做出抉擇。當面臨前述這種被稱之為「倫理難題（或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Banks, 2020）的抉擇情境時，依是否對衝突價值給予倫理原則排序而有排序法和非排序法兩種處理方式的區別（Úriz et al., 2017）。其中，作為前者代表人物的Frederic Reamer，無論基於全美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倫理守則起草人的立

場、或基於長期投入社會工作倫理理論研究和教學的積累，其《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Reamer, 1995, 1999, 2006, 2013a, 2018）書中觀點受到極大的關注。這一點也反映在我們教科書內容中。然而，相當可惜的是，對於Reamer早期所據以立論的Alan Gewirth論點，較少說明；對於Reamer晚近倫理原則排序型式的變化，較少描述。而這些變化我們認為它反映出了當代專業倫理論述變遷的軌跡。本文是梳理前述的暫時筆記。底下我們將先說明Reamer倫理抉擇中有關社工價值排序的指導原則，然後追溯他據以立論的依據，說明晚近他論著變化的可能意涵，最後則對Reamer倫理原則排序思想展開反思和反身。希望透過這些闡釋和商榷，可以作為思考相關問題的參考，其中疏漏則待日後補充。

貳、Reamer倫理抉擇中社工 價值排序指導原則 ——初步的說明

當面對倫理難題時，Reamer（1999）回顧效益論（Utilitarianism）（包含行動的和規則的，如：J. S. Mill）、義務論（Deontology）（如：I. Kant）、及以極大化最小傷害（maximin rule）為代表的權利理論（Rights-based theory）（如：正義論的J. Rawls）說明社會工作者將如何取捨。然後，基於善的概念與社會工作關注基本人類需求相符，價值、善、和義務排序有助支持專業處理社會弱勢需求的承諾等理由（Reamer, 2013b, p. 76），借鑑Gewirth（1978）《理性與道德》（*Reason and Morality*）三種「善」（goods，或直譯好東西）的分類與排序後，提出他的看法。

前述Gewirth（1978, pp. 54-58）所稱作為理性施動者（agent）、與自由（free）及幸福（wellbeing）相關的、帶有等級次序性的三大善，分別是：與施動者達成意欲目標行動所必要條件有關的「基本善（basic goods）」（如：生命、食、衣、住、心理平衡等）；一旦減損或喪失就會傷害施動者已擁有和取得未來目標能力的「不可減持善（non-subtractive goods）」（Reamer舉例如：不受勞動剝削、不受偷竊詐欺、不生活在惡劣環

境等）、和一旦取得會有助施動者提升其追求目標能力的「增益善（additive goods）」（Reamer舉例如：知識、自尊、財富、教育等）。

而當面對由價值所構成的諸義務（duties）彼此發生衝突將如何處理問題時，Gewirth（1978, pp. 342-345）以「普遍一致性原則（Principle of Generic Consistency, 簡稱PGC）」作為論證核心與方法，訴諸：a.預防或消除不一致（prevention or removal of inconsistency）；考量b.行動所必須的程度（degrees of necessity for action）；和c.制度性要求（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三項帶有字典式排列順序（lexical priority）的判準作為義務衝突處理的參考。而Reamer（1999）則在Gewirth所論基礎上進一步詮釋，最後提出社會工作者處理倫理難題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有：

- 一、禁止違反對個人生存造成基本傷害的規則要優先於禁止諸如撒謊、洩露機密或威脅增益善所造成傷害的規則。
- 二、個人對於基本幸福權的主張要優先於另個人自我決定權的主張。
- 三、個人對於自我決定權的主張要優先於他或她所擁有自身基本幸福權的主張。
- 四、出於自主所同意遵守法律、規則、和辦法的義務通常要優先於出於自願和自主違反這些法律和規則的權利。

五、在衝突情況下，個人對幸福權的主張可優先法律、規則、辦法、和志願結社中的協議。

六、防止基本傷害的義務和如改善住房、教育和公共救助等公共利益的義務要優先於完全控制個人財產的權利。

以上的原則相較Reamer（1983）《社會工作實務中的倫理難題》（*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一文內容，文詞解釋略有不同，並新增了第六點。相關中譯可見於包承恩與王永慈譯本（芮默·弗雷德利，2000，2009）及曾華源等人（2002，2021）闡釋。不過，Reamer所說內容要如何理解，立論依據又如何推出、內中變化又反映出何種人性預設等等，頗值得推敲。底下為此我們進一步試著說明。

參、Reamer倫理抉擇中社工價值排序的內容——進一步闡釋

倫理難題解決方法，在絕對主義者（*absolutist*）眼中認為有原則可茲依循；反之在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看法下則認為受情境和個人主觀偏好影響，難有原則可以參考。大約以2006年（《社工價值與倫理》第三版出版）為界，在此之前Reamer站在絕對主義者觀點，參考字典式排列順序提出前述六點作為面對諸義

務衝突的指導原則。而這些指導原則源出Gewirth（1978, pp. 338-354）中「諸義務的各種衝突」（*conflicts of duties*）的觀點，我們先從此著手並說明Reamer的原則排序。

一、Gewirth義務衝突的排序與Reamer倫理難題處理指導原則

前文言及a.預防或消除不一致、b.行動所必須的程度、和c.制度性要求是Gewirth區分基本善、不可減持善、增益善後處理諸義務各種衝突的判斷要點。其中的a、b、c反映了應用時的字典式排列次序。我們扼要摘出並對照Reamer原則，說明如下：

a. 預防或消除不一致。如果一個人或團體侵犯或即將侵犯另一個人或團體的普遍權利（*generic rights*），從而導致相互作用不一致（*transactional inconsistency*）時，則採取行動防止或消除此種不一致是正當的。……。

b. 行動所必須的程度。每位施動者都有尊重受動者（*recipient*）對其行動所必須善（或直譯好東西、財貨更易理解）的權利主張，在彼此相衝突的義務間，若前種義務所涉及的善對行動所須更必須，若對前述善進行權利主張時不能不透過違反後一項義務就無法被保護

時，則前一項義務優先於後一項義務。……。

- c. 制度性要求。當人在複雜社會中互動時，必須有規則來管理其互動……具程序正當性的規則，只要受動者繼續自願接受該規則，其要求就優先於不強迫受動者的義務。……以上（旨在）增加社會某些人相對小的成本，來防止其他人不得不承擔更大成本，從而使所有人的普遍權利能更加地平等。……。

上述判準a是Reamer原則1（禁止違反對個人生存造成基本傷害的規則要優先於禁止諸如撒謊、洩露機密或威脅增益善所造成傷害的規則）的主要出處。行動阻卻侵犯普遍權利、避免自由及幸福受到基本傷害是核心。它所保障和表達的不單只是人有尊重他人自由及幸福這項普遍權利及其所代表的基本善、不可減持善、及增益善的義務內容；也指出了一旦有所取捨，基於預防和消除我承擔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但他人卻不履行尊重我權利的義務這種相互作用不一致情況發生的行動順序。另外Gewirth在判準a中對前述已授權的強制除了做出僅限於違規者、不超出授權範圍、主要針對已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補充；對過去造成傷害的集體他也留出了類似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轉型期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的制度空間，並對公民有權反對支持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給出說明。

至於，行動所必須具有優先性是判準b的重點。它主要反映在Reamer的原則2（個人對於基本幸福權的主張要優先於另個人自我決定權的主張）。在面對由不同重要程度所構成善的義務時，施動者尊重受動者帶有目的性行動所必須是主要的考慮。遵守自願結社中程序正當的規定、尊重自我決定權利主張的義務，相較於防止造成基本傷害、尊重幸福權利主張的義務，後二者對受動者而言更具行動所必須性。然而，若就受動者自身言，在不受強制（亦即自由自主的）情況下，對行動所必須做出符合自主意識的解釋，施動者依然具有尊重此項權利的義務，而這正是Reamer原則3（個人對於自我決定權的主張要優先於他或她所擁有自身基本幸福權的主張）的安排。

而當面對組織、法律制度、與社會生活時，遵守出於自由並且符合程度正當性的規則是判準c的內容。它反映在Reamer的原則4（出於自主所同意遵守法律、規則、和辦法的義務通常要優先於出於自願和自主違反這些法律和規則的權利）中。而參照前述判準b，我們也可以發現，著眼組織的原則4是著眼個人的原則3的延伸。相類似的情形，Reamer的原則5（在衝突情況下，個人對幸福權的主張可優

先法律、規則、辦法、和志願結社中的協議）則是原則2的延伸。Reamer最後一項倫理難題處理指導原則6（防止基本傷害的義務和如改善住房、教育和公共救助等公共利益的義務要優先於完全控制個人財產的權利）則是判準c制度性要求的後半段，是以符合民主程序的方式、透過集體力量促進普遍權利得以對社會公眾平等化的策略。在這個部分Gewirth特別提出公共倡議義務的重要性。

以上三項義務衝突處理的判準，並非在所有面向都互斥。在面對不同義務衝突的不同情境，它們各有不同考慮。如果諸義務間出現或即將出現「相互作用不一致」時，這些判準就會以前述次序，來防止或消除它。而當前一項判準沒那麼明確涉及時，後一項判準就可能適用。這也是Gewirth之所以稱字典式排列順序的理由。

二、Gewirth義務衝突處理原則的立論依據

前文大致對照了Gewirth與Reamer解決義務衝突原則排序的內容，但對Reamer所依據的Gewirth又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次序安排，仍令人好奇。要明白Reamer原則如何應用，似乎很難繞過Gewirth立論的理路。接下來我們試著說明這一點。

作為一名倫理理性主義者（ethical

rationalist）的Gewirth，從區分行動者（actor）與施動者（agent）入手尋找一種普遍有效的最高倫理原則。為了方便說明這個起點，我們把人不具動機和目標的動作稱行為（behavior），與之相反、具動機和目的的活動稱之為行動（action）。而用來指稱前述只及於自身但不涉及他人的行動主體為行動者（actor），行動施於他人並因此造成影響的主體稱為施動者（agent）；相對前述受其影響的主體叫受動者（或施動對象，recipient）；而施動者要能發揮影響所必須的能力稱施動能力（agency）。有了上述的用語之後，在往後的理解上會方便許多。

接下來，Gewirth（1981）從「所有的倫理原則都關心人的行動」開始論述人類施動能力（human agency）和理性的邏輯結構，察考施動者和受動者彼此的相互作用（transaction）關係，最後推出足以規範不同施動者的普遍性原則：總是按照你的受動者和你自己的普遍權利來行事。略去其中複雜反向證明的推論過程，我們簡單說明如下（Nickel & Reidy, 2010）：

1. 我做X是為了目的E（I do X for purpose E）。由於目的E是施動者我所認為值得追求的，所以施動者我接受，
2. E是一種善（E is a good）。為了要實現我的目的 E，我在執行X時，需要有以下二個最基本的必要條

件，否則我做不到：

- (1) 我需要有執行它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強迫）、
 - (2) 我還要有實現它的能力（擁有資源和條件的幸福），基於理性、審慎、和自我利益，
3. 自由（free）和幸福（wellbeing）對我是種必要的善（它可以細分為基本善、不可減持善、及增益善三大類）；
4. 我必須擁有自由和幸福；
5. 我有主張自由和幸福的權利；
6. 其他人也主張他的自由和幸福的權利；
7. 當我體認到，若單方主張自己的權利，很難避免其他人也對我主張同樣的權利，最後導致我權利受到侵犯時，為了避免痛苦和矛盾，
8. 基於施動者和受動者的相互作用（transaction），引入「普遍一致性原則（PGC）」，推導出
9. 施動者如對待自己般總是按照受動者普遍權利的方式行事（the agent acts in accord with the generic rights of his recipients as well as of himself）；即我有尊重其他人自由和幸福這項普遍權利的義務，其他人也有尊重我前述權利的義務。
10. 只有在某些情況下，其他人有可能可以干涉我具有尊重他人自由

與幸福這項普遍權利的義務；即

- (1) 預防或消除權利受侵犯或即將受侵犯的行動，
- (2) 相較之下，是行動所更必須的，
- (3) 規則是具備程序正當性的。

以上之所以長篇累牘指出Gewirth立論的過程，最主要目的是，一方面想透過這些來說明前述義務衝突處理判準的出處；再方面則是期望藉它來凸顯Reamer在接受其觀點的同時，很難避免不接受這項推論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人性預設。而這些人性預設是非常值得令人深究的。

三、Gewirth普遍一致性原則下的人性預設

首先，理性自利的行動者是貫穿Gewirth 論證中最突出的人性預設。它以施動能力的形式展現在前述論證的整個過程中。例如，知道自己的目的E、採取必要的行動X、明白執行X行動必須的自由和幸福、並對它們主張權利，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護自身前述權利而選擇透過「行動要符合接受者以及你自己的普遍權利」（Gewirth, 1978, p. 135）這項「普遍一致性原則」的方式，推論出適用所有人的倫理原則。而這些再再顯示出了理性自利在其中的關鍵位置。不具備（或擁有較少的）理性、無法從自我中心立場出發，在人、我、甚至與生態環境互動中求得生存後，但又謙抑（modestly restriction）的行

動者是不容易接受這個前提的。

再者，施動者、受動者具有相同認知能力和相同認知內容的預設。儘管倫理行動所須的施動能力在內容上還包含了情感和意志的作用，但在Gewirth 倫理理性主義式的論證過程中，除了看重認知能力的作用外，它也反映出施動者和受動者雙方對於自由和幸福都有著均一、沒有質和量差異的權利保護及主張。換言之，在Gewirth推論過程中，施動者所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也一定就是受動者所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他們都具有相同的認知能力以及相同的認知內容。

最後，抽離脈絡式中立存在的預設。假定施動者和受動者雙方具有道德相似性是共同性倫理學的觀點。在這個觀點底下，極力找出普遍一致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最高道德指導原則是目標。Gewirth所提「施動者如對待自己般總是按照受動者普遍權利的方式行事」這項「普遍一致性原則」就是代表。而為了達成前述目標，把擁有理性的行動主體抽離出具體的脈絡，不受諸如性別、情感、意志、歷史、宗教、文化等差異的影響，就邏輯證成方法上而言較為可行。因此，此處的施動者與受動者們是抽離脈絡式的一種中立性的存在。

當然以上人性預設，在後現代思潮衝擊下引發對前述理性主義倫理學人性預設的極大挑戰，多方思想彼此之間有著精采

的交鋒。其中諸如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如：C. Gilligan、N. Noddings等）、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如：A. Macintyre、M. Walzer、C. Taylor等）、乃至後現代倫理學（Postmodern Ethics，如：Z. Bauman、R. Rorty等）等，或著眼性別、或論說德行、再或側重直覺、情感、宗教、歷史、文化、脈絡等諸種因素，開啟了非關理性（irrationalism）的倫理學論述取向。而這些或多或少影響著Reamer晚近觀點的變化。

肆、Reamer倫理抉擇觀點的轉變

回顧Reamer《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各個版次，從中可以發現他依據Gewirth義務衝突處理三判準所發展出來的六原則，除了在1999年第二版出現外，在此後2006年、2013年、以及2018年所更新的第三、四、五版中已經移除。原因Reamer書中沒有直說。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往後的改版中逐步新增了諸如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共善（common good）、社會目標、合作的德行，有助抗衡個人自利思想；關懷倫理（ethic of care）展現了公義倫理（ethic of justice）之外的多元道德觀點，以及其中對關懷、情感承諾、願意委身特定關係下行動意願（Reamer, 2006, 2013b）；乃至德行倫理

學 (Virtue Ethics) 中對善良、慷慨、勇氣、正直、尊重、正義、審慎和同情等專業品格 (Reamer, 2018) 等更豐富的介紹。他指出社會工作者對於不同理論觀點、相互衝突的社會工作價值及其排序適用性難有一致看法。而且這些對價值與義務意見的合理分歧，諸如為案主保密、保護第三方、知後同意，會更加地強烈。但儘管如此，他似乎帶點樂觀或帶點安慰地強調，在許多案例中，面對相互衝突的價值和義務，社會工作者也不是完全沒有共識。雖然有例外，但即便在困難的案例中，衝突的義務中到底哪項最是優先我們還是很清楚的。

以上Reamer的補充，或許反映了他對當代倫理學變遷的回應和基本心態。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再從Reamer (2013b, 2021) 文章中則可以發現，在前文中Reamer除了以一位見證者的角度回溯社會工作倫理不同時間的不同重點之外，已經把他的觸角延伸到數位倫理所引發的，諸如保密、知情同意、利益衝突、雙重關係、服務轉介及終止等新興的議題 (Reamer, 2013b)。

而在後文中，他以電車難題這個著名的問題為例，在對我們所熟悉效益論、義務論、權利論、德行論、和關懷倫理進行討論之餘，增加了「雙重效應 (the doctrines of double effect)」和「分配豁免 (distributive exemption)」這兩個概

念。藉著前者對起心善意、期望獲得善果，但卻事與願違的行動後果該如何評價的問題，如為挽救孕婦生命卻保不住胎兒；和後者對無論如何都會造成重大傷害的威脅將如何進行分配的省思，如電車轉轍器旁的旁觀者要選擇放手讓電車撞向五人還是改轍撞向一人），把意圖 (intent)（或許譯為「蓄意」更好理解）帶入了社會工作者對道德行為評價的視野中 (Reamer, 2021)。而以上可以標示出Reamer社會工作倫理的論述取向已經從認知論 (cognitivism) 尋找可普遍化原則的路徑，逐步轉向到對非認知論 (noncognitivism) 對包含了意圖在內的、與直覺甚或情感有關的關心。他清楚反映了倫理學討論重點的變化。

伍、代結論：從Reamer倫理抉擇價值排序議題討論轉向所引發的反思和反身

前文中，我們從Reamer社會工作倫理抉擇的衝突價值排序六原則展開說明，梳理了他所依據的Gewirth觀點和背後所持的人性預設，然後從其後續著作中提出他論述轉向所反映的倫理學討論趨勢。而這些具體成果反映在他對參與NASW倫理守則逐步完善過程中的貢獻 (Reamer, 1998, 2020)。

面對這位自1976年左右就讀博班時

期便開始投身相關領域研究（見前述〈我的見證〉）（Reamer, 2013b），至今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人物，作為遠方華人文化下的後繼同行者，在閱讀其相關著作的同時很難不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子『行的通』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之所以特別標注「行的通」，意味著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倫理學和社會科學中「行」所包含的，諸如「知」、「情」、「意」、「行」、以及它們四者以不同程度相混合的過去知識積累和當代學說發展；更包含了在參酌西方（特別指NASW倫理守則）的當下，我們所持續不斷的、在本地基礎上針對『行本身』和『得以能行』相關的個體理解、行動者養成、所置身組織、法律制度、歷史文化脈絡等圍繞在專業群體周邊的理論反思與文化反身。

在這個部分，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探索和累積（如：白倩如，2020；曾華源，2011；張英陣，2016）。這些帶有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乃至實務操作的知識，無論就哪方面來說所涉及議題都極為龐大，它們彼此相互交織，還需要我們以更有系統性的方式持續探索和研究。也因此，我們以底下的暫時看法作為代結論。

首先，就Reamer所預設人性而言，理性自利、單一面向均質式認知、以及抽離脈絡中立性預設下的行動者，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工作倫理抉擇參考依據，如效益

論、義務論、權利理論，在當前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社群論者、德行論、乃至泛稱為後現代論者們的助力下，試圖兼容多重哲學典範並以含攝文化（culture-inclusive）取徑找回華人文化主體性的心理學嘗試（黃光國，2012），或許會是可能的出路。但無論公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二者如何兼容（容／融不容／融得了、在哪個基礎上容／融），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原子式自我（atomic self）和社群論式鑲嵌式自我（embedded Self）如何安頓（社會最基本構成，個人與結構如何統一），到含攝華人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大傳統／小傳統、陰陽二元對立的消解）如何界定，凡此種種有具體實踐的，也有哲學思辨的，如陳復（2016），陳舜文（2021）的疑問，樁樁件件所引發的新困惑不見得要比舊問題來的挑戰小。而這些在根本上，又關聯著社會工作如何理解圍繞在我們服務對象及周邊的利害相關人（包含環境）；還有社會工作到底要把人助到哪裡去，自由與幸福會不會是哪個彼岸，如果不是，又會是哪一種或哪幾種的追問。

再者，對倫理行為的討論從理性認知到非關理性要素的變化，引出了對直覺、情感、關係、情境的重視。其中，情境倫理學（Situation Ethics，如：J. Fletcher）將人從普遍式道德規則中解放出來，讓人回到所身處特定時刻和情境做出道德選擇（Dimmock & Fisher, 2017）；關懷

倫理學則強調女性在關係中所特有的親密（intimacy）、信賴（trust）、責任（responsibility）、和關聯（connection）等概念（Gilligan, 1982），這些論點給我們帶來不少啟發。另外，德行倫理學看重品格（character），特別是作為德行的品格（virtue of character，如：勇敢、仁慈、慷慨等），它以中庸為行動標準，透過經驗及習慣的鍛煉養成，最後形成氣質傾向（disposition）追求幸福（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22）。它有助社會工作者內在專業角色性格的養成（Banks, 2020; Beckett et al., 2017）。不過儘管如此，情境論者（如：G. Harman）與德性論者間對於到底有沒有品格這回事始終有其爭議；回歸特殊情境的道德選擇，如關懷倫理下近似差序格局或儒家五倫般很難擺脫愛有等差、不易推愛的批評；而看重社群的德行論，不同文化與社會有著不同品格德行的認定，因此有過賴所屬社會文化，無法指導行為，難以跨出個人領域甚或難脫權力集團社會建構的批評。面對這些莫衷一是的說法，與其邯鄲學步，不如放回具體案例、兼聽之後，擇善而從或許是務實的對策。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最終我們還是要回到倫理難題的本質。它是我們作為行動者卻受限於專業角色和所處位置，對兩個自身都討厭的、甚至不清楚哪個才是正確的價值選項中，所不得不做出的

抉擇。這種抉擇原本就不容易，它既與做出抉擇所置身的高度複雜、急迫、和不確定情境有關；又與個人外在組織制度法規和壓力團體脫離不了關係，例如自我角色期待過高、經驗知能缺乏或有限，工作和角色負荷過重、相關單位權責不明、孤立少援缺乏專業支持、外在壓力團體權利倡議、缺乏或少有督導的同時因循舊習、違法濫權瀆職怠職受到法律咎責等等，這些進而升高了倫理抉擇的難度。尋找一顆萬靈的「銀色子彈」，藏身於「標準作業程序（S.O.P.）」，照章辦事，消極避禍，是可能的期待。只要快快緩解伴隨倫理難題的義憤、自責、不安、後悔、與罪咎感。然而，Banks（2020）認為它不可能，也不必要。面對倫理難題、面對前述各種學說，更面對社會工作實務環境的高度脈絡化和複雜性，沒有簡單的一種答案，因此它不可能。而訴諸「標準作業程序（S.O.P.）」在做出倫理判斷和抉擇的同時無需背負個人責任，只會變成防衛型的實務工作者（defensive practitioner），因此它不必要。在我們社會作專業教育上，Reamer（2018）留給我們的不單只是：析辨社工專業價值及與個人價值、清楚社工倫理原則及倫理難題、學習倫理抉擇所需倫理理論和抉擇模式、瞭解倫理風險管理相關法規及程序；更重要的是，反思參與前述與倫理有關的系列過程，體認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作

為一個道德的專業（Chu et al., 2009）、作為一個道德的社會工作者或學習者所必要的（Hugman, 2005）。或許，在我們回顧Reamer和他所據以立論的Gewirth之後，期待自身能夠成為可以清楚多元倫理學說、析辨倫理議題（ethical issue）、問題（ethical problem）與難題（ethical dilemma），和不輕忽權力在結構中作用的「反思型的實務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與覺察置身華人文化脈絡、清楚自身定位及所涉各造的相互作用

用、並且回過頭能批判省視自身扮演何種角色和勇於變革的「反身型的實務工作者（reflexive practitioner）」會是我們頗值得努力的目標（Banks, 2020）。

（本文作者：王篤強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李素慶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鍵詞：倫理抉擇、價值排序、Reamer、Gewirth、普遍一致性原則

參考文獻

- 白倩如（2020）。《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困境與出路》。洪葉。
- 芮默·弗雷德利（Reamer, F.）（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二版）（包承恩、王永慈，譯）。洪葉。（原著出版年：1999）。
- 芮默·弗雷德利（Reamer, F.）（2009）。《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三版）（包承恩、王永慈，譯）。洪葉。（原著出版年：2006）。
- 張英陣（2016）。〈愛與正義：社會工作教育實踐社會工作價值的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5，51-61。
- 陳復（2016）。〈黃光國難題：如何替中華文化解開戈迪安繩結〉。《本土心理學研究》，46，73-110。
- 陳舜文（2021）。〈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之延伸思考與疑問〉。《本土心理學研究》，55，143-149。
- 曾華源（2011）。〈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教育之回顧與前瞻性議題〉。《社區發展季刊》，133，430-444。
- 曾華源、胡慧嫻、白倩如、許雅喬、李仰慈（202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倫理概論：社會脈絡下的倫理實踐》（四版）。洪葉。
- 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02）。《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倫理概論》。洪葉。
- 黃光國（2012）。〈論「含攝文化的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36，79-110。<https://>

doi.org/10.6254/2011.36.79

- Banks, S. (2020).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 (5th ed.). Macmillan Education.
- Beckett, C., Maynard, A., & Jordan, P. (2017). *Values & ethics in social work* (3rd ed.). SAGE.
- Chu, W, Tsui, M.-S., & Yan, M-C. (2009). 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2(3), 287-298.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0810206>
- Dimmock, M., & Fisher, A. (2017). *Fletcher's situation ethics*. In M. Dimmock & A. Fisher, *Ethics for A-level: For AQA philosophy and OCR religious studies*. Open Book Publishers.
- Gewirth, A. (1978). *Reason and mor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ewirth, A. (1981). Are there any absolute rights?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1(122), 1-16. <https://doi.org/10.2307/2218674>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gman, R. (2005). Exploring the paradox of teaching ethic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education*, 24(5), 535-545. <https://doi.org/10.1080/02615470500132772>
- Nickel, J., & Reidy, D. (2010).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D. Moeckli, S. Shah, S. Sivakumaran (E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pp. 39-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1983).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28(1), 31-35.
- Reamer, F. G. (1990).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1995).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1998).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s. *Social work*, 43(6), 488-500.
- Reamer, F. G. (1999).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2n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2006).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3r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2013a).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4th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2013b).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ork ethics: Bearing witness.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15(1), 163-181. <https://doi.org/10.18060/14637>
- Reamer, F. G. (2018).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5th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 (2021). Trolley problem and the nature of intention: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ethics. *Th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18(2), 43-54.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22, October 11). *Virtue ethic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thics-virtue/>
- Úriz, M., Idareta, F., Viscarret, J., & Ballestero, A. (2017). Methodologies fo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nual of social work*, 24(1), 33-54. <https://doi.org/10.3935/ljsr.v24i1.124>